

引用格式: 张虹, 公静, 王潇一. 基于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标准化机理研究[J]. 标准化学报, 2026(5): 25-32.
ZHANG Hong, GONG Jing, WANG Xiaoyi. Research on the Standardization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Relations[J]. Journal of Standardization, 2026(5): 25-32.

基于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标准化机理研究

张虹 公静 王潇一*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摘要: 【目的】标准兼具生产力要素资料与生产关系范畴的双重属性,在产业科技变革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明确标准化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与新质生产关系调适中的逻辑演进、作用机理及实践路径,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原理为理论基础,采用系统分析方法,梳理标准化从技术到产业再到制度的演进规律,剖析其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与新质生产关系调适的过程机理与作用机制。【结果】标准化随生产力发展历经技术形成与突破期、产业发展与应用期、制度变革与调整期3个阶段;通过技术更新、组织衔接、系统融入的三维耦合过程,依托生产要素与生产流程标准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借助利益分配与治理规则标准化调适新质生产关系,实现二者动态平衡。【结论】标准化是连接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的核心纽带,需从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制度融合、国际引领等方面精准发力,充分发挥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新质生产关系优化的支撑引领作用,同时需正视其局限性,与多类治理手段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标准化;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关系;逻辑演进;过程机理;作用机制

DOI编码: 10.3969/j.issn.2097-857X.2026.05.003

Research on the Standardization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Relations

ZHANG Hong GONG Jing WANG Xiaoyi*

(China Electronics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Abstract: [Objective] Standards possess dual attributes as both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element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study aims to clarify the logical evolution,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standardization in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dap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reby providing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ethods] Grounded in Marxist dialectical principles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this study employs systematic analysis to trace standardization's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from technology to industry to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It dissects the process mechanisms and operational dynamics through which standardization facilitates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adaptation of new quality relations. [Results] Standardization undergoes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 alongside productivity advancement: the period of technological formation and breakthrough,

作者简介: 张虹, 博士,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国际标准化战略、政策与理论。

公静, 硕士,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标准化理论与政策。

王潇一, 通信作者, 硕士, 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标准化理论与政策。

the phas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and the era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adjustment. Through a three-dimensional coupling process involving technological renewal,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ic incorporation, standardization cultivat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y standardizing production factors and processes. Simultaneously, it adapts new qual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by standardizing benefit distribution and governance rules, achieving a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the two. [Conclusion] Standardization serves as the core link connec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norms. Precise efforts must be made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to fully leverage its supporting and guiding role in developing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optimizing new qual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Simultaneously, its limitations must be acknowledged, requiring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with diverse governance approache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standardiz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relations; logical evolution; process mechanism; operational mechanism

0 引言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指出,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1]。从技术支撑的角度,标准可视为生产力的要素资料;从基础性制度的角度,标准亦属生产关系的范畴。这为思考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系统一体的标准化提供了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而生产关系的优化又将反作用于生产力的释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不尽相同^[2]。习近平总书记首创的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守正创新^[3]。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4]。伴随产业科技的日新月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随之呈现出新的范式特征。总结而言,在驱动逻辑上,新质生产力突破传统“要素叠加”的线性增长模式,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核心驱动力,而非依赖资源投入的规模扩张。在要素构成上,数字要素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与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深度融合,形成数据、技术、人才的新型要素组合,区别于传统以物质资本为主导的要素结构。在产业形态上,新质生产力打破单一产业边界,催生跨领域融合

的新业态,而非传统产业的垂直分工模式。在演进速度上,技术迭代周期大幅缩短,呈现代际更新、爆发增长态势,远超传统科技的渐进式发展节奏。正如胡磊^[5]指出,新质生产力催生了更具社会化和共享化特征的数智化生产资料,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脑机接口为代表的前沿技术,不仅推动生产要素形态从物质资本主导向数据要素驱动转型,更催生了产业组织模式、制度规则体系的系统性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标准化作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的纽带,其角色已超越传统技术接口统一的工具属性,逐渐演变为塑造新质生产力、调适新质生产关系的重要力量^[6]。

当前,孤立式技术垄断导致的霸权化、颠覆性技术爆发导致的黑箱化等问题,制约了技术红利向产业效能的转化;另外,隐私安全风险、伦理道德偏见、权责划分争议等制度性障碍,进一步加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之间的适配矛盾。因此,在产业科技变革与制度适应性调整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标准化在其中的作用与角色,是新质生产力形成与新质生产关系调适的必然要求。朱斌^[7]提出,新质生产力落点在新,关键在质,而标准则是源于新,立于质,二者均紧系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更进一步,从实践需求层面,我国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新阶段,在破解技术创新瓶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纾解民生就业压力等方面,标准化都可发挥

积极作用。

1 不同时期标准化的逻辑演进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量,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标准化从技术到产业再到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逻辑演进, 剖析其形成新质生产力与调适新质生产关系的过程机理(如图1所示),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更对实践层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标准化的发展始终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深度切合, 体现在标准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核心目标的一致性上。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目标, 标准化的目标从解决技术适配问题, 逐步延伸至优化产业运行效率, 然后上升为完善制度治理体系, 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决定了标准化面临的核心矛盾、聚焦的关键任务与采用的实施路径存在一定差异。

1.1 技术形成与突破期的标准化: 破解“技术碎片化”难题

在技术创新的萌芽与突破阶段, 标准化主要破解的难题是技术碎片化与协同创新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此阶段, 一方面, 不同经营主体基于自身

技术优势开展差异化创新, 使技术路线呈现多元化、分散化的特征。另一方面, 技术早期所需的高投入和阶段性的高风险, 对跨主体协同协作提出高要求。因此需要标准化引导技术路线收敛和创新资源集聚^[8], 可通过推动原理、实践向指南、标准转化。从历史实践看, 1983年,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电压等级标准IEC 60038推动全球电压向230/400 V靠拢, 为电力产业提供统一尺度。无线电技术萌芽时, 各国采用不同的频段划分与信号传输方式, 导致跨区域通信受阻。国际电信联盟(ITU)制定无线电通信基础标准, 有效解决了技术碎片化问题。从当前实践看, 我国在量子通信技术研发初期, 同步启动《量子密钥分发(QKD)系统技术要求》等标准的预研, 作为国内首个量子保密通信行业标准, 通过标准框架引导研发方向, 为QKD设备选型、组网建设及商用部署提供了统一规范, 避免技术路线的盲目探索。

学者认为, 标准化活动确立最佳秩序, 通过有序化原理, 推动共同利益的开发^[9]。在技术发展的早期, 标准化重点解决技术衔接、统一、兼容的问题, 同时还辅以计量检测、认证认可等手段, 对技术成果的标准就绪度、有效性等开展验证, 目的均是通过“统一、简化, 协调、选优”的标准化原理^[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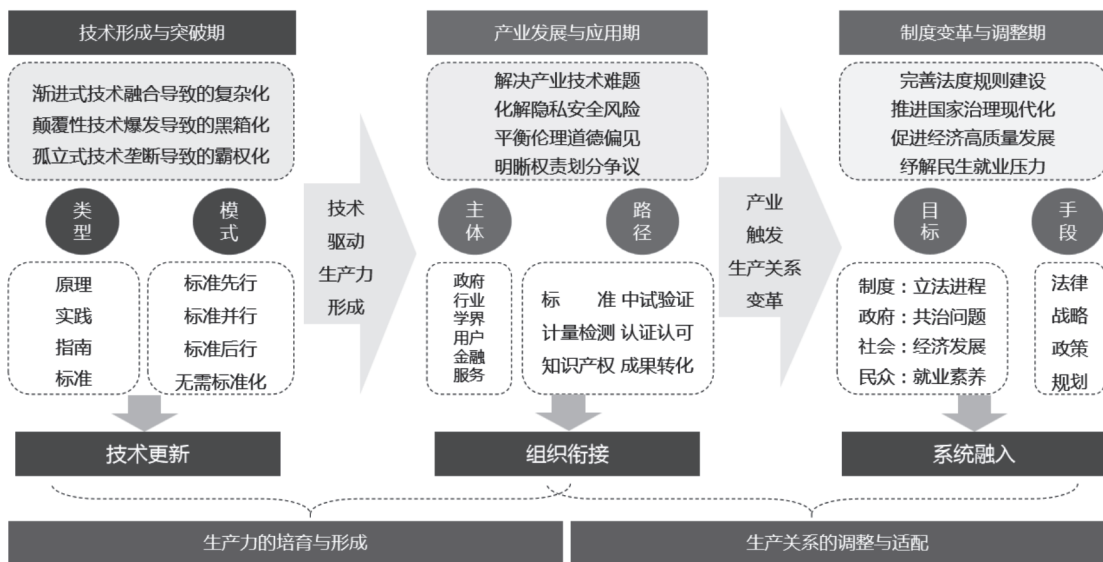


图1 标准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调适的过程机理

降低技术协作成本,为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奠定基础。

1.2 产业发展与应用期的标准化:化解“产业协同性”障碍

当技术进入产业化应用阶段,产业生态的复杂性、经营主体的多元化成为主要特征,标准化面临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协同性不足与规模化应用需求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产业链上下游存在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也对技术和产品的统一规范提出要求。因此,需要标准化在此阶段聚焦产业效率提升和市场秩序规范的目标。

主要可从两方面着力,一是推动从技术标准向管理标准与服务标准延伸,在产业发展与应用期,除根据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继续完善技术接口标准之外,标准化伴随产业规模扩大延伸到生产管理、供应链协同、售后服务等全链条环节。从历史实践看,20世纪初期,美国福特公司通过制定零部件统一标准,实现汽车生产流水线作业,对推动汽车工业规模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产业兴起时,主板、硬盘、操作系统等部件接口不统一,英特尔、微软等企业通过主导制定硬件接口与软件兼容等方面的事实标准,推动实现个人计算机的规模化生产与普及。从当前实践看,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规模扩张,不仅催生了车载操作系统等接口标准,还匹配了自动驾驶数据记录、充电桩要求、车辆安全检测服务等多类型标准,为推动产业规模有序扩容,规范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标准依据。二是在此阶段不同技术交叉融合还会带来不同产业场景应用中标准适配问题,如“AI+制造”“5G+医疗”等融合领域的发展,使技术复杂度呈指数级增长。标准技术指标的制定和规范的出台,可以有效解决跨领域技术适配问题。

在产业应用期,标准化的作用是通过全链条规则统一优化资源配置和集中,为产业协同,生态扩容提供良好的标准化实践基础。

1.3 制度变革与调整期的标准化:调节“制度适配性”矛盾

伴随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深入,二者对制

度环境提出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的需求。为适应这一需求的转变,标准化也进入制度变革与调整期。在此阶段,标准化要面对“旧有制度约束”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新的生产要素带来的数据隐私、算法伦理、权责划分等制度性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传统法律与政策体系难以覆盖新的技术场景和产业应用,制度空白和过度监管问题都将制约生产力释放。因此,需要标准化在制度治理和立法联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一是推进对颠覆性技术黑箱化与伦理道德偏见的治理。标准化通过算法可解释性标准等透明化标准、AI伦理评估框架等伦理审查标准,可有效化解技术黑箱化带来的治理难题。二是促进标准化与立法进程的协同联动。一定意义上,标准化是法律制度的“软工具”,可通过标准将法律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要求。从历史实践看,20世纪90年代,环保议题进入全球议程。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推动全球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化需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1993年成立ISO/TC 207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该系列标准制定工作,通过对环境管理体系、环境审核等核心标准作出要求,将环保要求转化为企业可操作的管理流程,推动环保制度在各行业领域的实施落地。从当前实践看,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出台后,ISO/IEC吸收其中内容制定ISO/IEC 29100系列标准,使GDPR的实施更具可操作性;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也通过引用《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国家标准,实现法律与实践的衔接。

在制度变革调整期,标准化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制度性规则统一”破解新旧制度矛盾,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2 标准化助力形成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调适的过程机理

伴随产业科技革命的深入,新质生产力的形

成和培育成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新质生产力要求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生产要素重构与生产效率跃升,与之相应的新质生产关系则关键在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利益分配优化与治理体系升级。其中,标准化作为连接技术与制度的中介,通过技术更新、组织衔接、系统融入的递进过程,既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形成,又实现新质生产关系的调整与适配。

2.1 标准化与技术更新: 夯实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基础

技术更新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动力,而通过对不同技术类型的标准化创新,可以有效应对技术创新中的分散化与不确定性难题,推动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发展。

通常而言,针对不同技术发展特征,通过严格的科学的验证测试,开展标准就绪度评估,对标准先行、标准并行、标准后行、暂时无需标准化等情况进行评测,对不同技术的发展程度和标准化时机进行确认,以此选择不同的标准化模式。例如,在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颠覆性技术领域,此类技术由于突破传统认知,具有重构产业格局的特征,采用标准化预研引领模式,可通过在技术研发初期即启动标准预研,起到明确技术发展方向,促进技术路线选择与收敛,增强技术优势的作用;在工业软件、智能传感器等渐进式技术领域,根据此类技术具有的迭代升级、持续优化等特征,可以采用动态更新的标准化制修订逻辑,通过跟踪技术发展的节奏,定期修订标准的内容、指标、参数,确保标准与技术发展同步;在“AI+医疗”“5G+工业互联网”等融合性技术领域,由于此类技术大多跨领域、多接口、系统复杂,因此可以建立跨行业、跨部门的协同标准化模式,解决不同领域技术的适应性和匹配性问题。

此外,可通过2种技术模式推动标准创新成果的转化加成。一方面通过标准加专利的融合模式,将核心专利纳入标准,实现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协同;另一方面可以依托标准加中试验

证的迭代模式,依托产业创新中心实现标准制定到中试验证再到标准动态更新的过程。其中,标准必要专利作为适配新质生产力技术迭代快、协同需求高特征的重要创新手段,其核心价值在于平衡创新保护与产业协同的关系。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核心技术高度依赖原创性专利,若缺乏标准必要专利机制,可能出现“专利壁垒”阻碍技术协同的问题。部分企业掌握核心专利却拒绝授权、专利许可定价过高等问题,导致产业链上下游无法共享技术成果,增加产业应用成本。而标准必要专利通过明确纳入标准的专利需遵循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11],既保障了创新主体的专利收益,激励持续研发投入,又确保产业链企业能以合理成本获得专利授权,推动技术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2.2 标准化与组织衔接: 构建新质生产关系的组织基础

新质生产关系的核心在于打破传统组织边界,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格局。标准化通过明确不同主体的权责定位、优化组织协作路径,推动组织模式从线性分工到协同联动的转型。

标准的制定实施过程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多元主体平衡角色定位和相互协作的过程。对于政府而言,要实现从管理者到引导者与协调者的转变,将战略、政策、规划与标准充分协同。对于企业而言,作为经营主体,企业是标准的核心参与者,要不断将自身定位从标准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制定者,通过参与标准制定,将自身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同时严格执行标准,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对于社会组织而言,行业协会、科研机构、认证机构等社会组织,是连接政府与企业的协调者,在标准的组织、管理、宣贯、推广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民众而言,其既是标准的受益者也是标准的监督者,尤其是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实施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此基础上,标准化有助于构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组织协同路径。纵向看,建立了从企业、

地方、团体、行业、国家等层级分明、相互衔接的标准体系,对解决标准碎片化、分散化提供了整合性路径。横向看,促进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跨国家的标准联通,通过建立跨行业标准联盟、参与国际标准组织,增强了标准的协调性和互联互通性,实现国际通用、国内适配。综合而言,标准化通过明确主体权责、优化协作路径,打破了传统组织模式的边界,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这也是新质生产力要求下新质生产关系的新特征。

2.3 标准化与系统融入:实现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的动态平衡

系统融入是将标准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通过目标与手段的协同,实现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的动态适配——既通过标准化推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发展,又通过标准化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最终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从目标上看,标准化的系统融入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民生福祉提升等发展目标。经济发展层面,标准化通过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为引导技术创新、推进产业有序发展提供规范支撑。国家治理层面,标准化通过将治理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标准,使国家治理从经验式向精准化发展,提升了各个行业开展治理工作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标准化有助于将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对推动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新路径发挥积极作用^[12-13]。民生福祉层面,标准化通过规范产品质量、优化服务供给,解决民众急难愁盼问题,使民生保障更具针对性与可及性,有助于提升民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从手段上看,一是标准可与法律、政策协同,作为法律实施的技术支撑与政策落地的具体抓手,推进具体法律、政策、规划的精准落地。二是标准可与智能技术结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提升标准化的制定效率与实施效果。三是标准可与治理手段结合。通过将标准化纳入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使标准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找准定位。

因此,需要在生产力层面,标准通过技术创新、资源调配、产业协同,有助于生产效率的跃升,形成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层面,标准通过组织衔接,有助于联动多元主体,构建组织基础,调适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关系,进而在治理层面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平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民生福祉提升注入能量。

3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端推进标准化发展的方向建议

当前,我国标准化发展进入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从国内驱动向国际引领的关键阶段。新质生产力瞄准技术创新主导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新质生产关系聚焦制度创新适配与利益分配优化。标准化作为连接技术与制度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方向必须紧密对接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需求与新质生产关系的制度需求,避免“泛化适配”,通过精准发力,切实为新质生产力培育与新质生产关系调适提供支撑。为更好地发挥标准化对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的支撑引领作用,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端协同发力,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制度融合、国际引领,高水平推进标准化工作。

3.1 新质生产力层面,夯实技术基础,提升产业效能

3.1.1 对接技术创新需求,推动技术标准从“跟随式”向“引领式”转型

针对新质生产力原创性技术依赖度高、迭代速度快的特征,需通过标准预研、中试验证与专利协同,抢占技术制高点^[14]。一是建立颠覆性技术标准预研机制。针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颠覆性技术,建立研标同步机制,支持企业、科研机构开展标准预研。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前瞻开展技术趋势研判与标准框

架设计,避免技术路线的盲目探索。二是完善技术标准中试验证体系。依托产业创新平台,探索建立技术标准中试验证基地,对新技术标准进行有效性、适用性验证。推动中试验证结果与标准修订挂钩,鼓励企业参与中试验证,使标准更符合产业实际需求。三是推动标准与知识产权深度融合。完善标准必要专利制度,建立标准专利数据库,明确标准专利的纳入条件、许可规则,避免“专利壁垒”阻碍技术协同。支持企业将核心专利纳入国际标准,提升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力。

3.1.2 聚焦全产业链协同,推动产业从“分散化”向“集群化”转型

针对新质生产力跨领域融合、产业链协同需求高的特征,需通过全链条标准体系、跨产业标准协同与区域标准统一,提升产业协同效能。一是构建产业链全链条标准体系。针对高端装备、工业软件、高端芯片、大飞机等重点产业链,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研制标准图谱,加快制定关键共性标准,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标准协同。二是推动跨产业融合标准制定。针对“AI+制造”“5G+医疗”、工业互联网等跨产业融合领域,协调不同行业的技术规范与标准冲突。加快制定跨产业融合的接口标准、数据标准、安全标准,为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提供规范支撑。三是完善区域协同标准机制。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试点推动制定统一的环保标准、物流标准、公共服务标准,打破区域壁垒,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3.2 新质生产关系层面,优化制度环境,提升国际话语权

3.2.1 深入推进制度融合,推动标准化从“技术工具”向“制度载体”转型

针对新质生产关系制度适配需求强、民生保障要求高的特征,需通过标准与法律、政策的协同,完善制度支撑体系。一是建立标准与法律协同机制。根据法律要求及时制定或修订相关标准,推动标准成为法律实施的技术支撑。二是完善标准与政策衔接机制。在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民生政

策中,将标准作为政策落地的具体抓手。建立政策实施效果与标准修订的反馈机制,根据政策实施情况优化标准内容。三是加强民生领域标准供给。聚焦食品安全、医疗服务、养老服务、教育装备等民生领域,加快制定一批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标准。加强民生标准实施监督,建立标准实施效果评价机制,确保标准落地见效。

3.2.2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我国从“标准大国”向“标准强国”转型

针对新质生产力全球化协同需求高、国际规则话语权重要的特征,需通过国际标准参与、国内外标准对接与国际治理协作,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一是提升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度。持续支持企业、科研机构参与三大国际标准组织活动,主动将我国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规则。二是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建立国际国内标准相互转化快速通道,加快国际标准采信转化的同时,同步推进我国优势标准的国际化转化。面向全球南方,推动我国高铁、光伏、电力等优势产业标准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对接,实现“标准走出去”与“产业走出去”相互赋能。三是参与全球标准治理规则制定。积极参与WTO、G20等国际组织的标准治理活动,提高中国声量和贡献度。加强与美欧日韩等经济体的标准合作,主动协调标准差异,推进标准互认。建立健全金砖国家标准合作机制、上合组织标准合作机制,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标准治理中的话语权。

4 结语

本文尝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解读新时期标准化对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的作用,以期标准化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视角。从标准化的演进逻辑和过程机制上看,标准化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培育,对新质生产关系的调整和适配,均非单向的推动或匹配,而是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制度融合、治理体系等一系列实践努力,推进技术更新、组织衔接、系统融入,实现

二者的协同发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标准化将在产业科技创新的进程中,不断完善和优化自身的角色定位,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更有力的作用。

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标准化并非“万能工具”,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存在固有局限性:其一,难以全部覆盖颠覆性技术的前沿探索阶段。新质生产力依赖的原创性技术往往处于“无先例、无参照”的探索期,过度超前的标准化可能固化技术路线,束缚创新活力。其二,无法直接解决核心

资源供给问题。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大量研发投入、高端人才与关键设备,标准化仅能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却不能直接创造资源。其三,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业态往往跨多个行业。标准制定的跨部门协调成本高、周期长,可能滞后于产业发展速度,无法及时提供规范支撑。因此,标准化工作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有在筑牢基础规范、促进协同发展的同时,为创新留足空间,与政策扶持、市场机制、人才培养等手段协同发力,才能真正支撑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EB/OL].(2021-10-10)[2025-09-19].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513.htm.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
- [3] 洪银兴.新质生产力下劳动价值论向创新价值论的拓展性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9):1-8.
- [4] 习近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EB/OL].(2025-01-15)[2025-09-19].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1/content_6998715.htm.
- [5] 胡磊.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内涵、要求与方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9):81-92.
- [6] 张虹,王潇一,公静.标准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标准化地位和角色转变升级的视角[J].中国标准化,2025(7):29-34.
- [7] 朱斌.论传统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模式和标准化路径[J].中国标准化,2025(8):67-70.
- [8]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标准化知识百问百答[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5:21.
- [9] 白殿一,王益谊.标准化基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3-4.
- [10]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主编.电子工业标准化[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17.
- [11] 马玉骁,张虹.标准必要专利管理原则与实践[J].质量与市场,2023(14):4-6.
- [12] 唐兴霖,赵逸飞.新质生产力赋能国家治理:机遇、挑战与实践路径[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0.
- [13] 郭敬东,朱琰,唐攀,等.标准化基本原理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探析[J].标准科学,2024(12):21-25.
- [14] 索贵彬,秦晓蓓,韩荣荣.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空间溢出特征及门槛效应[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3(2):44-60.